引子：皇姑屯的巨响

本世纪的 20 年代，有两条重要的铁路干线分别到达和通过今名“沈阳”、时称“奉天”的东北重镇。一条是京奉铁路，起于北京，经由天津、山海关，止于奉天，为中国所控制；另一条被称为“南满铁路”，由长春南下，经过奉天，直达大连，归日本人管辖。京奉线临近奉天处，有一个小车站，名叫“皇姑屯”。从皇姑屯向东行三四里路，便到了一个名叫“老道口”的地方，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就在这里交汇。交汇处，有一座南北方向、架在钢筋混凝土桥墩上的铁桥，南满铁路从桥上通过，京奉铁路则穿行桥下。

1928 年 6 月 4 日凌晨，同往常不同，老道口附近万籁俱寂，显得有点异常。两条铁路线上均无往来车辆，也无行人通过。以往，桥上常有日本兵来回巡逻，可这天，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大约 4 点多钟，不正常的寂静才被打破。从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火车声。几分钟后，一列专车从西边的皇姑屯向老道口开来，很快驶抵铁桥下面。突然从桥下接连发出了两声震天动地的巨响。顿时，火光冲天，铁桥被炸坍，刚驶到桥下的几节火车车厢被炸碎，桥上桥下的铁轨、石块、木板等在空中翻转飞旋……

这幕惨剧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被炸的是奉系军阀头目、北洋政府末代元首张作霖乘坐的专列。

张作霖的专列，是 6 月 3 日凌晨 1 点从北京前门车站启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由于抵抗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南方“北伐军”失利,张作霖决定退出北京，回到关外奉系的老巢。6月2日,张作霖以大元帅的名义正式发布了《出关通电》。当天夜里,他就带着六姨太马夫人和三公子学曾及部分随从，离开了中南海大元帅府，登上了出关的专列。随从之中,有靳云鹏、潘复、莫德惠、于国翰、阎泽溥、刘哲等人，还有两个日本顾问町野和仪我。

张作霖所乘的专列，由二十多节车厢组成。其中，有一节车厢设计精美,装饰豪华,宽大而舒适。车厢里设有大客厅、卧室，备有沙发坐椅、金色丝绒窗帘及各种高档用具。据说，这是过去慈禧太后的专用花车，现在，则成了张大帅的包车。

专车驶离北京前，大帅府的密电处曾收到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一份电报,电报称“:老道口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加防备。”谁知张作霖看过之后,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小题大作”，甚至还命令密电处以他的名义致电留守奉天的吴俊升，要他训斥齐恩铭。该电说“:齐随本帅多年,其本性轻举妄动,好造谣言。现日本方面与我缓和,勿庸顾虑,应严予申斥!”

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齐恩铭提供的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而张作霖的轻率则使他犯了一生中最后的一个大错误。

尽管张作霖不以为然，他的随行人员却免不了暗生疑虑，惴惴不安。不过,大家担心的,是在山海关出事。谁也没有想到,在老巢奉天的大门口会有什么不测。

专列从北京开出之后，一路上似乎都很顺利。当时在大帅府密电处工作、并随张作霖乘专列回奉天的周大文后来回忆说：

> 专车平安开出山海关后，大家觉得放了心，都解衣而睡。吴俊升上车同张作霖见了面，彼此说了几句话之后，他们就和刘哲、莫德惠、常荫槐等玩了一夜扑克牌，一直到快

到皇姑屯时才散。车到新民时已经天亮，我看沿铁路两旁皆有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式,十余步就是一岗。可是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地点附近，就没有看到哨兵警戒了。

张作霖的专车抵达天津，是 6 月 3 日清晨。除有人下车外，还有人上车，此人即奉系的骨干人物常荫槐。专车从天津站开出后，设在车上的临时军事办公室曾致电奉天：“主座专车于今早 6 时半安全通过天津北上。”与此同时，日本驻天津领事馆也电告奉天关东军司令部：“张作霖专列已于今晨 6 时半,由天津开往山海关。”这表明，日本方面不但正在严密地监视着张作霖的动向，而且对他的行程也掌握得清清楚楚。

3 日下午 4 时左右，专列驶达山海关站。吴俊升从山海关上车后，专列又继续北上。夜幕降临时，张作霖曾回到卧室稍事休息,由六姨太马夫人给他烧制大烟泡、替他捶腰。喷云吐雾之后，张作霖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睡意全消。于是,他又回到大客厅，同聚在这里的刘哲、莫德惠、常荫槐等人一起玩纸牌。3 日深夜，专车经过锦州站,曾停下来加水、检修,耽误了较长的时间,故到新民时,已是 4 日拂晓了。下一站,便是皇姑屯。

对张作霖的专列过皇姑屯及遇炸的情况，周大文是这样回忆的：

专车过皇姑屯时，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来接。齐登车后，专车即向东行驶，开往小西边门外奉天车站。数分钟后穿过南满铁路桥洞时，我正在走廊向外张望，忽见南边有两个着黄色制服的人跑上南满铁路大堤。我进入包房，尚未坐定,即闻轰然一声巨响,刹那间又是一声,比前一声更大,车才煞住,我被震昏倒在地上。等我恢复知觉,睁眼一看,包房

里车窗和窗前小桌不知去向，满地都是玻璃碎片。当时我疑惑已经受伤，可是试试四肢皆能转动，站起来又摸摸身上，也如平常，并无疼痛之处，只发现左手掌流血，可能是被碎玻璃扎破的。我取出药布药棉擦了伤口，没来得及包扎，就赶快跑出包房。在车厢走廊里看见我们的机枪卫队，排列向南北两方扫射约数秒钟，经何丰林喝令停止射击，枪声停止。我下车一看，大吃一惊，张作霖那辆包车全部车厢塌下，已不成车形，后面那辆饭车也是一样，还直冒烟，开始起火。再一看南满路铁桥东面桥栏矮铁墙炸得向天竖立起来，洋灰桥墩东面上半截炸去三分之一。这时大家忙于抢救受伤的人员，首先我看见吴俊升被数人架上一辆皮棚马车，向市内而去(后据闻当时已死,头顶穿入一大铁钉)。又看见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向车头方面跑去。又看见莫德惠从车上抬下来，送赴小西边门外奉天市立医院，刘哲是带着伤自己步行走去的。这时张作霖已经被抬上宪兵司令齐恩铭的一辆破旧汽车，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车中，回转帅府去了……

张作霖当时虽身负重伤，却仍有知觉，甚至还能说话。他被齐恩铭等人用汽车送回大帅府之后，医生对他进行了紧张的抢救。然而，在爆炸案发生 5个小时之后,即 6 月 4 日上午 9 点半左右,张作霖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死去。绝命前,张作霖曾对侍候在身边的二太太卢夫人说：“ 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恐怕不行了 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 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这大概是张作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小六子，是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的乳名。

张作霖死后，为防止日本人乘机制造事端，稳住奉天局势，

等待张学良回奉，大帅府决定秘不发丧，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直到张学良从关内前线赶回沈阳之后，帅府才正式宣布：张作霖因伤重于 6 月 21 日不治身亡。自然，这是一个假日期。

皇姑屯炸车案发生后，凡是没有偏见的中外人士，几乎都明白，这是日本人一手策划制造的。张作霖本人对此也很清楚。临死以前，他曾明确无误地告诉自己的家人和随从：“这都是日本鬼子干的。”

尽管事实昭然若揭，日本方面却采取嫁祸于人的手法，千方百计地妄图掩盖事实真相。在炸车案发生之前，日本方面就在肇事地点附近故意制造了一起所谓的“日军枪挑两名‘南方便衣队员’事件”。接着，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又主动地派领事内田到奉天交涉署，请求奉方派员会同日方调查此事。奉天交涉署署长高清和遂派科长关庚泽前往调查。关到现场时，见地上倒有年约 30 多岁的男尸两具，尸体旁放着一个破搪瓷面盆，面盆里有两个上锈的小炸弹，还有一张信笺。信笺上印有“救国军总司令部公用笺”字样，并写有“兹派王盛德等去东北三省一带工作”等内容。日本领事内田告诉关庚泽：“这是南方派来的两名便衣队来扰乱东北的，走到我们守备队步哨网内，向他们盘诘，他们不答，我们就照军规把他们扎死了。”事实上，这一“调查”只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场戏，目的是为了证明南方已派出便衣队来东北，从而为炸车以后嫁祸于南方便衣队埋下伏笔。果然，“调查”之后不到 3 天，日本制造的假象便露了馅。

就在日军刺死两名“南方便衣队员”不久，一个从奉天监狱逃出来的人请求奉天守军给予保护。此人说：“我们数人在南满站做小工，因吸食白面，被日本警察抓走，拘留在一处，也没有审问，先给我们剃头洗澡，然后换上新衣服和新鞋，并且给我们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好的，喝好的。住了好几天以后，昨天半夜忽然把我们几个人叫出来,带到南满路铁桥地方,对我们说:‘ 你们随便走吧。’ 当时我觉得莫明其妙，可是我准知道日本小鬼没安好心眼，我早就提防上了。果然,这时过来几个日本兵,一语未发,用枪刺向头先的几个人就扎。我一看不好,撒腿飞跑,拼命逃进城来,那几个人则死活不知。’原来,被日本兵挑死的‘ 南方便衣队员 ”;就是被日本警察抓来的吸食白面的‘ 犯人 ”。

在制造了皇姑屯炸车案之后，日本方面故伎重演，又搞了一个“ 调查 ”。奉方派出的代表仍是关庚泽。关到现场实地观察后认为，爆炸物显然是由上而下的，其破坏力之大，是手掷炸弹远远达不到的。在关庚泽调查的同时，奉方还派了兵工厂的专家前往爆炸现场察看。兵工厂的两名白俄技师报称：就爆炸造成的破坏程度判断,爆炸物须在 500磅以上，否则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破坏力。他们还说，爆炸物肯定是装在南满铁路桥上的，而装置这样重的爆炸物，绝非徒手所能办到，且至少要花数小时才能装好。这就证明，除了日本人自己，谁也不可能在日军严密护卫的南满铁路桥上干这样的事。

对于奉方的上述结论，日本方面参加“ 调查 ”的内田领事根本不予理会，他只是要求关庚泽在日方事先打印好的“ 调查报告 ”上签字，该报告的结论却是：皇姑屯爆炸事件是南方派来的便衣队所为。为了压迫关庚泽同意这一结论，内田甚至对关庚泽威胁说‘: 如果你不签名盖章,日本军人将对你不利。’可是关庚泽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如果签字,等于帮助日本欺骗全国人民，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绝不能这样干。因此，他不顾威胁，断然拒绝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

世人虽然都知道皇姑屯爆炸案系日本人所为，但由于日本

政府一直对此守口如瓶，人们多年来始终难以弄清此案的具体策划过程。直到二十年后，策划谋杀张作霖的主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作为战犯被捕后，世人才从他的供词中得知全部真相。

事实上，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对张作霖不满，早就有干掉张作霖的想法。奉系军队在关内同南方“北伐军”作战失利之后，关东军估计张作霖将退回东北，便加紧策划杀害张作霖。

起初，关东军内有两个互不联系的杀张计划在同时酝酿。一个以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为主，一个直接来自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河本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一贯主张用强硬手段对待奉系，扩大日本的对华侵略，故对杀张一事十分积极和主动。尽管河本为了抢头功，采取了独行其事的做法，没有同关东军司令部沟通，但他的想法和做法实际上得到了关东军头面人物的支持和默许。在河本加紧策划杀张的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也在考虑对张作霖采取极端行动。他计划派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去北京，意欲利用日本华北驻屯军对张作霖下手。不料，竹下义晴受命后尚未动身，这个计划就被河本知道了。老谋深算的河本认为，在北京下手风险太大，一旦失败,反而打草惊蛇,危及自己的计划。因此,他想方设法说服了竹下，要他放弃在北京杀张的企图，并拉竹下做他的助手，负责侦察张作霖的行踪，重点查清张作霖离京回奉的时间，以便于他自己在张作霖回奉途中采取行动。在河本的努力下，关东军内两个不同的谋杀计划，便这样合二为一了。

为确保杀张阴谋成功，经反复考虑后，河本决定采取炸毁张作霖专车的办法。他认为,这个办法万无一失,且能嫁祸于人。至

于炸车的地点，河本也作了一番周密的侦察和选择。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河本都考虑过。但在实地考察之后，他认为奉军在这些地区的警戒很严密，不易下手。最后，河本选择了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汇处的老道口。此地完全处于日军控制之下，既可以从容地进行布置，也可以瞒过奉方的耳目。

炸车地一定，河本立即将计划付诸实施。一方面严密监视张作霖的行动，除了让竹下去北京调查张作霖的动向外，又让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和田中隆吉侦探张作霖专列的编组情况和从北京开出的确切时间，还派石野劳男大尉在山海关，武田大夫、神田泰之助两名中尉在新民，掌握和报告专列通过这两个地方的确切时间。另一方面在预定炸车的地方，放置足够的炸药。在河本的直接指挥下，关东军的工兵队长管野等人秘密地将分装在 30 个麻袋内的 120 公斤炸药运到预定地点装好，接好电线。他们连续工作了 6 个小时，才将事情办妥。然后，河本派日本独立守备队的队长东宫负责控制安置在距桥墩 500 米外瞭望台上的电流开关。河本还让荒木五郎率领一支日军待命，万一炸车失败，就让火车出轨翻车，然后乘乱冲上去砍杀。总之，无论如何也要把张作霖干掉。

为了保守秘密，在装置炸药时及装置好炸药后，要禁止一切行人通过两路交叉处。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引起了奉方的注意，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因此致电在北京的张作霖，请他防备。齐恩铭当时并不了解详情，也未提出‘防备’，的具体办法，只要张作霖再谨慎一点，日方的阴谋很可能流产。张作霖的大意，使河本的阴谋完全得逞。

日本人为什么要置张作霖于死地？张作霖不是一贯同日本相勾结，不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军阀头子吗？日本为什么

要对这样“忠实”的代理人下毒手呢？

解答这些疑问，一切必须从头说起。

第一章　弱冠前后

生于乱世的“张老疙瘩”

1875 年 3 月 19 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一个男婴在辽宁省海城县北小洼村呱呱坠地，父母给他起了“张作霖”这一大名,但在他的孩提时代,大人们叫得最多的,却是他的乳名“张老疙瘩”。

张作霖虽出生在辽宁海城，祖籍却是直隶河间府，先祖也不姓张。对这一情况，张作霖原来也不大清楚。据说，直到当上了奉天督军，他的一个本家从直隶找上门来，张作霖才恍然大悟。魏福祥等人编著的《张作霖沉浮录》对此事作过详细描述：

> 某年夏在督署门前，有一个从河北赶来的长者，姓李，自称是张作霖的本家，要求见张作霖。守门的卫队把这位李姓长者拒之门外,斥之曰:“你姓李,督军姓张,两个姓不是一家人，哪里谈得上是本家？想在督军署衙门前拣便宜，妄想！——滚!”这位长者说死不走,梗梗着脖子向里闯。卫兵无奈，只好一五一十地向张作霖禀报。张作霖一愣，但仔细一想,好像想起了什么,就给卫兵打了个手势:“那就叫他进来吧!”
>
> 那位长者进入督军署，东张西望，手足不知所措。他见张作霖正襟端坐在堂上，便急不可耐地呼喊起来：“督军大

人,你可是咱们李家的后哇!”张作霖反问道:“此话怎讲?何以为证?”老人顺手掏出一折已经破旧的家谱,絮絮叨叨地讲起先祖的往事来:

“先祖姓李,清代家住河北河间府大名县。嘉庆末年姑母嫁给同县张姓,因无后,便将先祖过继给张家为嗣,从此改姓张。道光初年河北大旱,赤地千里,饿殍盈野,生活无着,先祖张永贵,携妻小逃荒,出关求生,落户于海城县叶家铺子小洼村。不知督军是否为张永贵之后?”张作霖频频点头,嘴里说:“正是。”长者又说:“请问督军先父大名?”张答:“张有财。”长者双眉舒展,笑曰:“正与我同属‘有’字。”张作霖虽为督军,但他是一个重血统、讲义气之人,当他听到这位长者所谈,句句有根有蔓,与自己了解的家世吻合,此人又与乃父为同辈,遂拱手道:“晚辈失礼了!”说完,当即命卫兵带长者入宅安歇,款待备至。

上述描述的依据皆为‘传说’,并非史籍记载。还有人说张作霖的祖先是在河北河间、河北高阳或河北高城,也有人说在山东等等。

不过,上述‘传说’也不是毫无根据和价值,多多少少也反映了某种事实。各种‘传说’虽然说法不一,有一点却相同,即都认为张作霖的先祖是由关内迁到关外的。

张氏家族中,究竟是哪一代先祖最早从关内来到关外的呢?比较多的说法是张作霖的曾祖父张永贵。张永贵闯到关东后,最初居住在广宁县,几经迁徙后,才落脚到海城。当时,他以务农为主,因辛勤耕种而逐渐富裕起来。到他的儿子,即张作霖的祖父张发一辈时,张家在关外已站稳了脚跟,有房有地,成为当地的殷实之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张家又衰败了,主要败在张发的儿子，即张作霖的父亲张有财的手里。

张发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张有财排行第三。张发其他的三个儿子都极老实，唯独三子张有财不务正业，终日游手好闲。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兄弟不睦。到张有财娶妻后，兄弟间终于分立门户。

分家后，张有财不仅没有改邪归正，反而更加放肆。他既不愿种地务农,也无心经商,成天在赌场中鬼混。如此坐吃山空,再多的财产也禁不住挥霍，何况张家并非大富豪！结果，张有财家日趋贫困，老婆孩子也只好跟着他吃苦受罪。

张有财最初娶邵姓之女为妻。邵氏曾为张家生过一个女孩，即张作霖的同父异母姐姐。由于张有财终日不管家事，邵氏不堪忍受，终因贫病交加不幸早亡。其后，张有财又娶本村王姓寡妇为妻。王氏曾与前夫生有一子，名作泰，亦即张作霖的同母异父兄长。改嫁到张家后，她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名作孚，即张作霖的二哥，另一个儿子就是张作霖。女儿即张作霖的妹妹，后来嫁给杨姓人家。

由于张有财胡作非为，到张作霖出世时，原先的那个小康之家早已成为历史。张家虽然还未穷到家徒四壁的程度，却也破败得够呛了。

张作霖降生到这样一个家庭，他的孩提时代自然也就无幸福可言。父亲一天到晚出没于赌场之中，很少关心自己的妻子儿女。母亲虽偏爱他这个“老疙瘩”,却因家境困难,连让他吃饱穿暖都很难,更谈不上对他进行什么教育、培养了。因此,张作霖自小就成了村里有名的‘野孩子”。他整天在外玩耍,摸爬滚打,逮鱼捉虾,除此以外,再无别的乐趣。孩提时代的贫困生活,使他养

成了不怕吃苦，敢闯敢干的性格。

家境贫寒令张作霖在童年备尝艰辛，恶劣的社会环境，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不良印象，对他后来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老疙瘩”出生的 19 世纪下半期，正是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世风日下的乱世。从 19 世纪初开始，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便由盛转衰，走上日趋没落的道路。1840 年以后，西方列强又不断地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扩大对中国的掠夺，中国的政治加速走向腐败，经济遭到空前破坏，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贫困，中国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整个中国犹如一艘在风浪中失控的航船。

“张老疙瘩”所在的东北，本是清王朝统治者的发祥地，随着整个中国的沉沦，到 19 世纪下半叶，东北已成了各种矛盾交织、多种危机并发的地区。

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以前，沙皇俄国即对中国东北垂涎欲滴。50 年代后期，乘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沙俄也大举入侵中国东北，不但强占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而且将侵略的魔爪伸到了黑龙江以南地区。当沙俄不断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同时，后起的日本也在伺机染指东北。1894 年，日本发动了旨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在打败清王朝之后，逼迫中国签订了包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等地内容在内的《马关条约》。日本此举又进一步刺激了沙俄，日俄两国从此开始了在中国东北无休止的争夺。沙俄为了独占东三省，一方面联合法、德两国，以“调解”中日关系为名，演出了一幕“三国干涉还辽”的把戏，逼迫日本退出辽东半岛；另一方面又借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之机，派出大批兵力，占领了东三省，企图一举兼并黑龙江以南的整个东北地区。尽管这一阴谋最后并未得逞，

但沙俄的侵略野心却进一步激化了与同样怀有侵华野心的日本的矛盾。

日俄两国对东北的侵略，给东三省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激起东北人民的愤怒反抗。比较中国其他地区，东北的民族矛盾显得更为突出，民族危机也显得更为深重。

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同样给东北社会带来了苦难。一方面，清王朝对列强的侵略步步退让，听凭侵略者在黑土地上烧杀奸淫,胡作非为,根本不管本国人民的死活 另一方面,清王朝又把因列强侵略、掠夺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广大人民头上，加倍对东北的百姓进行盘剥。结果，造成了东北社会的极度动荡，使东北出现了秩序混乱、地方糜烂、盗匪四起的局面，东北的社会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田野荒芜，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与关内各地相比，东北人民所遭受的痛苦显然更大更深。

如此乱世，往往会迫使更多的人铤而走险。张作霖所以能够成为割据一方、声名显赫的枭雄，同他从小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少年时期的张作霖，在乡邻的眼中，不过是一个名叫“张老疙瘩”与他们的孩子同样缺乏教养的穷人的儿子。如果说,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充其量也只是比别的孩子更顽皮，更不愿安分守己。

只读了半年私塾

光阴在苒，张作霖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眨眼几年过去，很快便到了应当读书学习的年龄。然而，进入学龄的张作霖，却未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去上学。

将张作霖摒弃在学堂大门之外，主要还是因为家境贫困，父母无钱供他上学。

张作霖读不了书，只能帮家里放放猪，当个小猪倌。除此以外，便到处玩耍，有时也跟在父亲后面出入赌场，为父亲和其他赌徒们跑跑腿。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天长日久，张作霖从父亲和其他赌徒那里沾染上不少恶习。张作霖敢于冒险的性格，就是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赌场既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冒险家的“坟墓”。不敢冒险，就进不了赌场。孩童时的张作霖，虽然够不上赌徒的资格，但他既然常常跟着父亲到赌场鬼混，耳濡目染，自然要受影响。

不过，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样的生活毕竟是乏味的。看到别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张作霖感到新奇和羡慕。于是，放猪或玩耍之余，张作霖不自觉地来到一家私塾外边。这是由邻村鞠家铺的秀才杨辅庆开办的私塾。里面正在上课，站在窗外的小张作霖自然听得到里面朗朗的读书声。起初，他听不懂学生们在读什么，因他常去，加上生性聪敏，慢慢地，他不仅听懂了不少，而且也能背出一些来。有时，在老师教的时候，他跟着里面的学生一起念。有时，他觉得光用耳朵听不过瘾，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便干脆用舌头舔破窗纸，眯着眼往屋里瞧。这样一来，他不但看到了许多熟识的小伙伴，也看到了老师所写的字，他学得更有劲了。如此“偷学”了一段时间，张作霖竟然也能把《三字经》背下来。

有一天，杨秀才让一个学生背《三字经》，这个学生背到“融四岁”时，对下面的内容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他急得满头大汗，越急就越是想不出来。正当杨秀才操起板子，准备打他的手心时，突然，从屋外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背书声“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杨秀才楞了一下，放下板子跑到屋外。在他眼前

的是一个十多岁长得虎头虎脑的孩子。看见先生出来，张作霖不再背下去了，但也不撒腿逃跑，只是楞楞地站在那里。杨秀才问了他不少问题，如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等。张作霖都一一作了回答。杨秀才又问他："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张作霖说："我在听大伙念书。"杨秀才还问他："你愿意跟我们念书吗？"张作霖没有正面答复先生的问题，只说了两个字："没钱。"看着张作霖这副聪明伶俐的模样，杨秀才心生几分怜悯，对张作霖说："你来上学吧，我不收你的钱。"

张作霖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蹦回家，将这件事告诉父母亲。读书毕竟是正途，既然先生不要钱就可让儿子上学，父母当然赞成。第二天，张作霖蹦着跳着去私塾读书上学了。

此时，张作霖已有十三四岁。张作霖在这个私塾读书的时间并不长，此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正式进过学堂。从后来张作霖的实际文化水平看，虽不能说高，却也足以应付日常了；再从张作霖留下的墨迹看，他的字也不算差。显然，这都是他当年在杨秀才的私塾里打下的基础。这些都说明张作霖读书是非常用功的。张作霖虽然只在杨先生的私塾里读过半年书，但对他的这位启蒙老师却一直十分尊重。张作霖发迹后，感念师生旧谊，又特地将杨秀才请到奉天，在张府成立私塾馆，让杨秀才做他儿子张学良、张学铭等人的开蒙先生。

张作霖很快辍学，主要仍是因为家境贫困。就在张作霖进私塾读书不久，他的父亲张有财突然死了，死因与赌博有关。

一次，张有财在赌场上赢了同村栾家堡子一个姓王的赌徒，姓王的无钱还此赌债。于是，张有财便不断地上门逼债，并扬言，如还不出钱，就让他以老婆抵债。王姓赌徒因此怀恨在心。一天，他俩同在路上走，走着走着又为还债一事争吵起来。姓王的乘张

有财不注意，突然猛踢张有财一脚。这一脚正好踢在张有财的致命处,他‘啊哟’了几声就一命归天。姓王的一看出了人命,自知闯了大祸，撒腿逃走了。张作霖的母亲一连两三天不见丈夫归来，便派人四处寻找，这才发现丈夫已被人打死在野地里。

张有财在世并没有给妻子儿女带来过幸福，但他毕竟是当家的。他的暴死，对王氏的打击最大。家境本来就不好，现在全家的生活就更困难了。张有财的死，对儿子张作霖也是个不小的打击，他从此与学堂断了缘份。

张有财死后不久，王氏的长子张作泰又患肺痨病，刚到弱冠之年，便不治身亡。接着，辽河流域的大水又将张家仅有的几间破草房淹没冲坍。王氏不得不带着次子作孚、三子作霖和女儿，投奔镇安县小黑山附近的二道沟娘家，求个暂时的栖身之地。

为了不让一家人饿死，王氏叫两个儿子设法自己谋生。次子张作孚当时已有十七八岁，征得母亲同意后，他决定只身到外面去闯荡。三子张作霖才十四五岁，尚不到单独外出的年龄，母亲寻思，不如设法让他学点手艺，虽不一定能赚到钱，至少也可以混口饭吃。起初，母亲托人说情，把张作霖送到一个木匠铺当学徒。但张作霖并不喜欢当木工，虽然听了母亲的话，进了木匠铺，却始终对干木工毫无兴趣。更令张作霖不满的是，他干了好几个月,却没有学到一点技术。因为师傅整天叫他打杂、干零活,甚至让他为掌柜的看孩子，倒尿盆，并不认真教他技术。张作霖不安于如此窝囊的学徒生活，没干多久便跑回了家。

母亲看他学不成木匠，便让他学做小买卖。母亲先托人到郭家包子铺说情，每天赊一点包子给他，让他去叫卖，赚一点钱补贴家用。就这样，张作霖当上了卖包子的小贩。谁知做生意，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